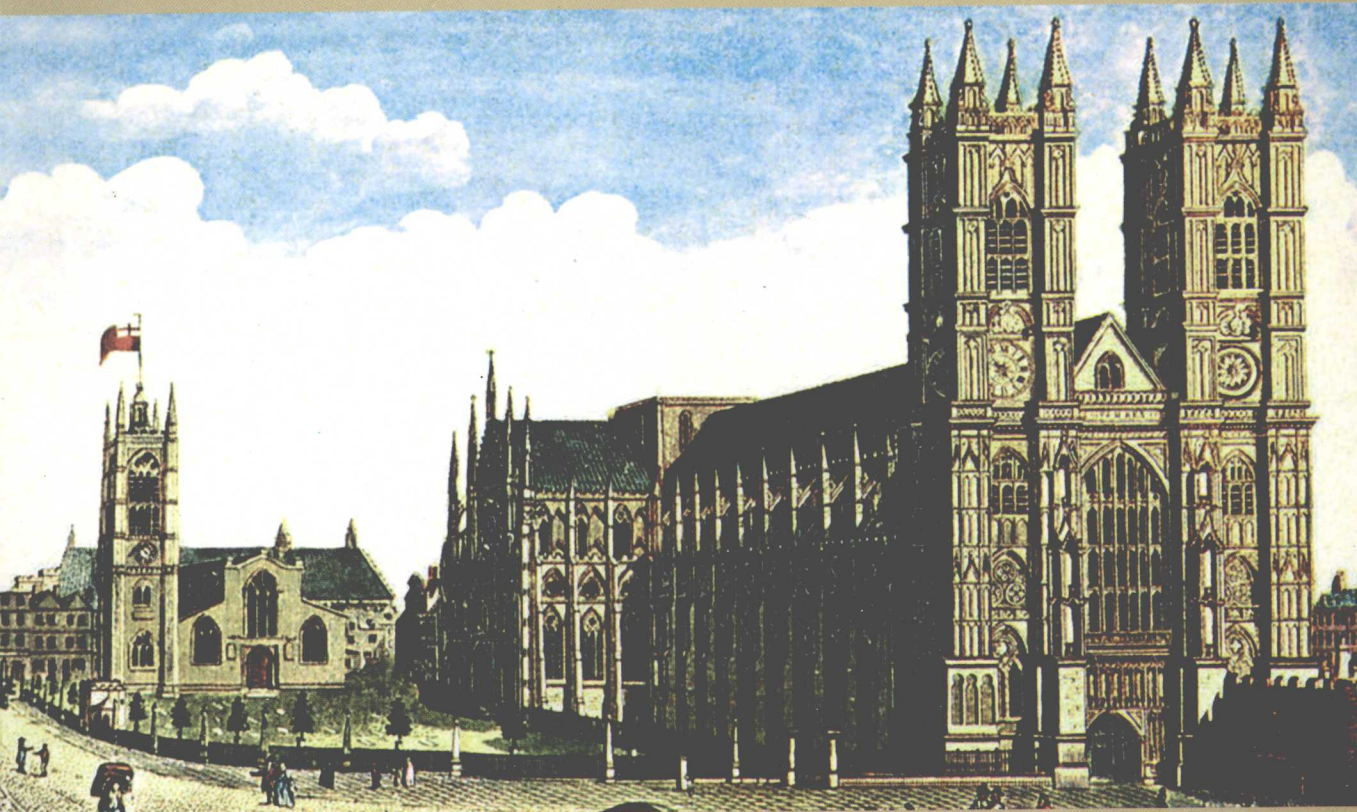




中西方文化比较与研究

CONTRAS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马永辉 王白菊 王化雪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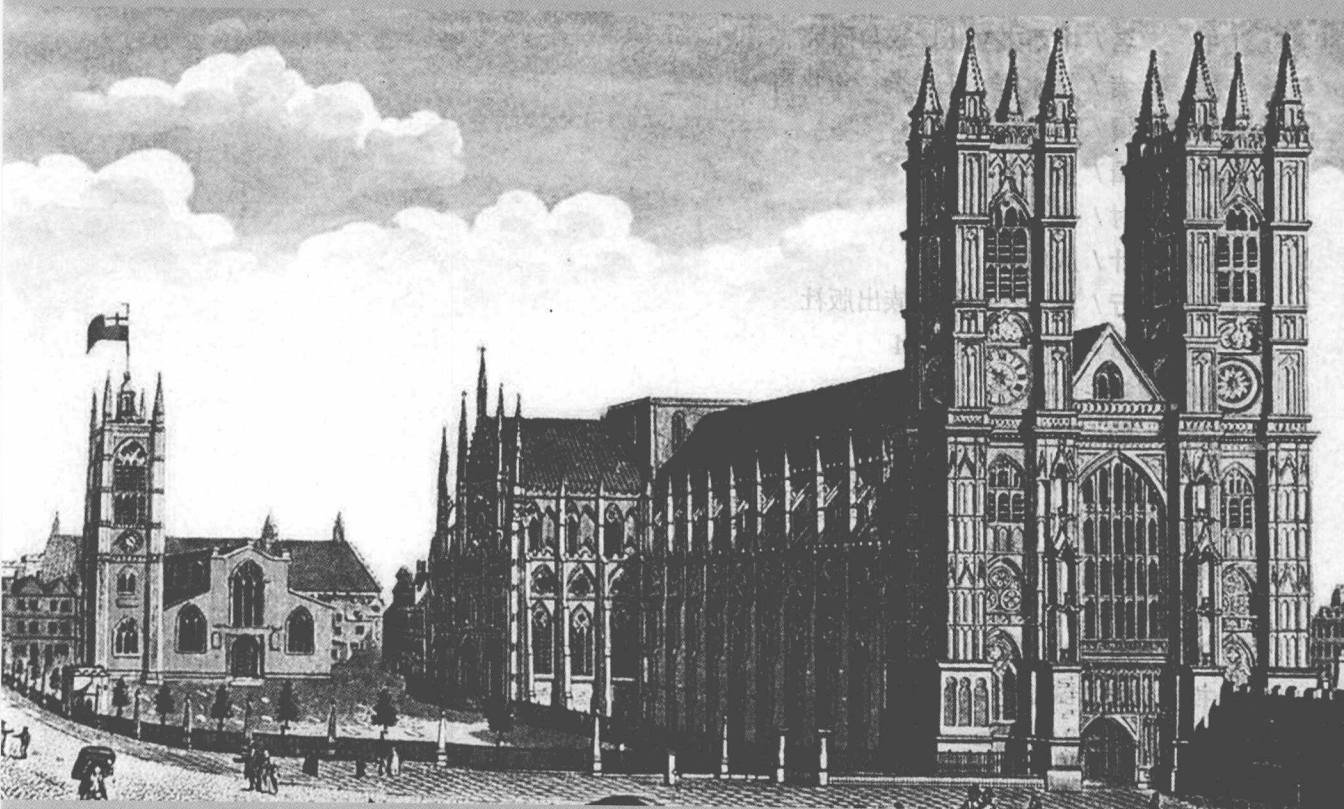
黑龙江出版社
朝鲜民族



中西方文化比较与研究

CONTRASTIVE STUDI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马永辉 王白菊 王化雪 编著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西方文化比较与研究/马永辉等编著.—哈尔滨: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2009

ISBN 978-7-5389-1642-3

I.中… II.马… III.比较文化—研究—中国、西方国家
IV.G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72042 号

书 名 / 中西方文化比较与研究

编 著 者 / 马永辉 王白菊 王化雪

特约编辑 / 于茂昌

责任编辑 / 金斗弼

责任校对 / 徐平松

封面设计 / 咸成镐

出版发行 / 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

发行电话 / 0451-57364224

电子信箱 / hcxmz@126.com

印 刷 / 哈尔滨翰翔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13.75

字 数 / 300 千字

版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89-1642-3

定 价 / 24.00 元

前 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联系日益密切,跨文化交际已不再是学术领域所独有的研究方向,经济、政治、新闻传媒、教育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对跨文化交际给予密切关注。

《中西方文化比较与研究》重点是研究跨文化交际中一些主要方面和问题,围绕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和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从地域环境、历史背景、价值观、思维方式、哲学、社会习俗、宗教、语言及教育等方面来探讨东西文化的差异及其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影响。我们的研究成果将有助于人们得体地顺畅地进行跨文化交际。

在对跨文化交际进行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研究成果不断扩充,以著作的形式呈现给广大读者。我们的宗旨是通过读者对我们的著作的阅读和不断的实践,使广大读者能够了解和掌握东西方文化的精髓,消除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跨文化交流的障碍,从而有利于东西方文化的学习与交流。

本书分六章,王白菊撰写第一章:地域与文化、第二章:历史与文化;王化雪撰写第三章:精神与文化、第四章:语言与文化;马永辉撰写第五章:教育与文化、第六章:跨文化交际实践篇。全书由马永辉策划和统稿。在我们写作过程中,得到业界同仁的帮助,同时借鉴了本领域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研究成果,在此我们由衷地向他们表示感谢。由于我们的能力和学识有限以及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所纰漏,敬请读者不吝赐教。

马永辉

2009年7月于大庆石油学院外国语学院

目 录

前 言	马永辉 1
第一章 地域与文化	1
第一节 中国文化发展之地理环境	1
第二节 英国文化发展之地理环境	10
第三节 美国文化发展之地理环境	15
第二章 历史与文化	22
第一节 中国文化发展之历史脉络	22
第二节 英国文化发展之历史脉络	47
第三节 美国文化发展之历史脉络	66
第三章 精神与文化	85
第一节 中西文化之价值观比较	85
第二节 中西文化之思维方式比较	99
第三节 中西文化之宗教文化比较	102
第四章 语言与文化	124
第一节 中西方语言在语法上的差异体现	124
第二节 中西方语言在词汇上的差异体现	133
第三节 英汉习语比较	138
第五章 教育与文化	145
第一节 中西方教育文化的源流与发展	145
第二节 中西方教育制度的比较	149
第三节 中西方家庭教育的差异	150
第四节 中西方学校教育的差异	154
第六章 跨文化交际实践篇	157
第一节 论文化对翻译的影响	157
第二节 英语委婉语研究	162
第三节 英语禁忌语研究	183
第四节 英语隐语行话研究	188
第五节 跨文化交际中的体态语研究	194
第六节 跨文化交际中的中西方价值观之比较	198
第七节 英语中的性别歧视研究	202
第八节 中英伦理道德研究	207

第一章 地域与文化

自从人类在地球上出现,首先就选择适宜的地理环境进行生活,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与生存的物质基础。地理环境决定物质生产方式的类型和特征,物质生产方式的不同影响着各地域人群的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由于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不同地域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以及行为方式也会有所不同,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进一步促成不同地域人们物质创造和制度创造的差异,并最终导致整个文化景观的差异。《管子·水地》篇说“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堯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流通者也,故曰水具材也。”普列汉诺夫曾说:“不同类型社会的主要特征是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形成的。一个民族早期处于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就会产生相应的文化特性”(普列汉诺夫,1962)。黑格尔从历史哲学的高度阐述了地理条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指出:“地理的基础”影响着人民的生产生活形式和性格的类型,从而影响着各个民族在历史上发生、发展及其所处的地位。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地理条件有三种特殊的差别,一是“干燥的高地同广阔的草地和平原”,它是产生畜牧业文明的基础;二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流过的地方”,这是孕育农业文明的地方;三是“和海相连的海岸区域”,它创造了辉煌的工商业文明(黑格尔,1956)。李约瑟认为地理因素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以及这些差异所涉及的一切事物的重要因素”(李约瑟,1979)。自然条件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社会思维的形成与变迁,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均有影响。

地理环境为塑造不同文化类型和不同的文化特性提供了内在的物质基础。当我们全面审视和考察中、西方(英、美为代表)文化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变的历史过程时,也必须了解和把握中西民族文化所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中西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地理环境,是指中西方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包括两个方面: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自然地理环境包括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气候等;人文地理环境包括疆域、政区、民族、人口、农业等。

第一节 中国文化发展之地理环境

一、中国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中国整体地理环境的格局是:外部封闭,内部复杂。《尚书·禹贡》是先秦最富于科学性的地理记载,被称为“古今地理志之祖者”。《禹贡》一文这样描写华夏族地理特征:“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教化波及大江南北)。”这得天独厚、特点鲜明的地理环境,是中华民族创造独具特点的历史与文化所依托的自然条件。

(一)面海靠山,形成相对独立的地域单元

中华民族生活的地理环境是一面临海、三面为陆的疆土广袤的封闭环境。北方地势起伏不大,为广袤无垠的草原与沙漠。在中国古代的民族历史上,北方各族人民虽与南部中原

人族类相近,但很少直接往来;自东北东南部沿海直到东南沿海,有两万多公里的海岸。唐代以来,海上交通日渐发达,明代有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但并未导致中华民族向海洋发展;西南群山莽林相绕,雄踞着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喜马拉雅山成为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天然分界,而横断山脉江河阻隔及热带丛林瘴疠之区,越往古代越是中国与东南亚之间交往的障碍;西北横亘着漫漫的沙漠戈壁,虽有一线可通(汉代已形成丝绸之路),维系着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往,然而在整个古代,这一片巨大而高寒的干旱地区仍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西北地理极限。在生产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这些都可以说是地理上的阻绝地带,给予农业民族无法突破的限制。

虽然一面临海,其它三面陆路交通极不便利,中华大地的内部却是广阔的原野,因此在内部拥有了辽阔的发展空间、回旋余地 and 相当开阔的环境。黄河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是适宜农业发展的两大温床,没有明显的天然屏障可以阻隔,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上都较海洋诸岛易于统一。所以当历史上强悍的游牧民族南侵时,汉族纵使丧失了首当其冲的黄河流域,仍有广大退路可供回旋。世界上其它古文明地区沦亡于外族的入侵,即一蹶不振,唯独中国能对边族潜移默化,始终保持着自己文化的独特风格和完整系统,并使之绵延不绝。

综上所述,中华大地第一个地理特点是:四周都有天然阻隔,内部构成体系完整的地理单元,形成一种与外部世界半隔绝的状态,使中国没有向外部世界拓展的野心,养成了独自经营、和平温顺的国民性格。所以中国文化大体上是在本土独自酝酿成长,虽偶有外来文化成分由西域或海上传入,皆能从容消纳,使中国文化的发展稳定而富于自信。

(二)西高东低,形成了三大阶梯式的地形地貌

中华大地的地理环境特点之二,是自西向东构成了落差显著的阶梯。第一阶梯是地势最高的西南部高原和山脉。这一地区高大绵长的山脉成为中国陆地地形的骨架。它们纵横交错,构成网络状,其间为形状各异、大小不等的高原、平原和盆地,组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地貌;其中青藏高原地势高峻,由大片海拔 4000 米以上的平缓高原和一系列海拔 5000—6000 米的绵长山脉组成,位于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的喜马拉雅山主峰珠穆朗玛峰,海拔高达 8844.43 米,为世界第一高峰。

第二阶梯是西北的戈壁沙漠地带,以及中部的高原与盆地。中国四大高原中的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以及四大盆地——四川盆地、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和柴达木盆地,都位于这一阶梯上。浩瀚高原与巨大盆地相间分布,海拔降到 2000—1000 米以下。其中内蒙古高原是一个草原、沙漠、戈壁交错的地带,历来也是北方草原民族进入中原地带的要冲,生活着达斡尔族、蒙古族、土族等民族。相邻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泾水、渭水流过地区,沃野千里,是中华文化重要的发祥地之一,历史上许多王朝都在这里建都。云贵高原北部的四川盆地的中央是富饶的成都平原,文明发展的历史十分悠久,汉族人在秦汉以前就已经大量居住在这一地区。

第三阶梯为地势最低的东部广阔的原野和沿海地带。北起大兴安岭,南到太行山—巫山—雪峰山一线以东地区,地势平缓,多为海拔不到 500 米的平原和丘陵。其中仅少数山峰高达 2000 米左右。中国三大平原——东北平原、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中国面

积最大的丘陵——东南丘陵，都分布在这一阶梯上，是阶梯中最低平的地带，滨海地带更低于海拔 50 米。中国沿海的海岸线很曲折，所以有许多良好的港湾。其中东北平原土地肥沃，居住着许多以狩猎和耕种为生的民族。几个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族群，如鲜卑、契丹、满族等，都起源于这个地域。

在地域辽阔的三大阶梯上，山地、高原、盆地、平原、丘陵这五种基本地貌类型都有大面积的分布，各自呈现出不同的自然景观，其中又以山地和高原的面积最广。众多的河流将大陆广大的地区联系在一起。黄河、长江两大河流流经中国的腹地，贯穿于中国三大阶梯之中，沟通着中国大陆的东西。汉水、淮河把长江、黄河联系在一起。长江的支流湘江和赣江与属于珠江水系的漓江、北江同发源于南岭山，秦朝时开凿的灵渠跨越湘江和漓江两大流域。西江则联系着岭南和云贵。总体来看，这些多种多样的地形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特点，呈明显的阶梯状由西向东倾斜分布。高山、高原以及大型内陆盆地主要分布在西部，丘陵、平原以及较低的山地多见于东部，宽阔缓斜的大陆架则在我国大陆东南侧延伸于海下。

(三)从南到北，气候的差异

落差显著的三大阶梯，西北背靠亚欧大陆，东南面向太平洋。因此，季风气候显著。由于季风气候的影响，我国雨量由东南至西北递减，东部低阶梯湿润多雨；中部第二阶梯，除云贵高原外，一般为干旱和半干旱气候；西北内陆距海数千里之遥，加上山岭阻隔，东方从太平洋、南方自印度洋吹来的温暖夏季风鞭长莫及，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青藏高原则成为高寒气候区。

由于地域辽阔，地形复杂，我国内陆形成多种多样的气候。三大阶梯内分布着东西走向的三列山系：最北一列是天山——阴山——燕山山脉；中间一列是昆仑山——秦岭——大别山山系；南列是南岭山系。三列山系作为南北冷暖气流的屏障，又构成了重要的气候分界线，呈现出热带、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寒温带从南向北递变的气候变化现象。其中海拔 1500—2500 米的秦岭山脉作用最明显。秦岭以北为暖温带，以南为亚热带，是我国南北气候的分界线。秦岭淮河以南，是以稻作农业为代表的水田农业和南方以种植水稻为代表的农业民族分布地区；秦岭淮河以北至秦长城以东以南为以粟、黍为代表的旱地农业区，也就是华夏/汉民族首先发展的地区；秦长城以西以北是草原游牧区和渔猎狩猎区，是北方游牧民族和狩猎民族分布与发展的区域。这三大区域三个民族分布带的交替作用，农牧两大类型经济和文化的相互渗透与结合，便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内部联系之所在。所以中华大地四限之内，自成体系，有多种地形，多样气候，而又资源丰富，互通有无，为多类型经济和多民族的发展，提供了极雄厚的物质条件。

中华大地地势由东南至西北逐渐增高，多数河流由西向东或由北向南流入大海。这种自然条件，往往决定收获的丰歉，再加上南暖北寒的气温，造成南长北短的农作物生长季节，这些条件对农民的垦殖发生吸引，所以形成人口南移、文化南进的趋势。每当寒冷期代替温暖期之时，总有大规模的游牧民族向南方湿润的地区迁徙，中原地区的农业王朝便面临着来自北方游牧民族的挑战。历史上曾出现几个典型的南北朝对峙的政治局面：北方的十六国及北魏、北齐、北周与南方的东晋及宋、齐、梁、陈对峙；辽、金与两宋政权的对峙；明初明政权与北元蒙古的政权对峙；明末南明政权与清政权对峙。由于长期的南北对峙，农业

民族要抵抗强大的游牧民族的南下,不得不凭藉专制集权的中央政府,以组织分散的农民去修筑万里长城,保卫自己的安居乐业,这就是中国专制集权体制长期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

随着人口的南迁,文化中心也逐步南进。秦汉时期定都关中,经济文化重心在黄河流域,有所谓“山东出相,山西出将”的说法。隋唐以后,粮食供给开始依靠南方,文化重心也开始向南迁移。到宋代,有了“苏常熟,天下足”和“江浙熟,天下足”的说法。到明清时期,又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此时中国文化以最富裕的长江流域为根据地,形成了“东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局面。至近现代,随着沿海经济的发展,广东、福建在经济上渐渐占据重要位置,中国的文化又有了进一步南移的倾向。

气候的变化产生了复杂的后果,或大或小地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开发、民族迁移、人口增长、文化传播,以至社会治乱和王朝兴衰。总体来看,我国的气候是南北有异,东西有别,东南沿海湿润多雨,水系发达,土壤肥沃,适宜耕作;西部干旱少雨,沙漠宽广,只宜放牧。

二、中国人文地理环境特征

(一)疆域

中国自秦始皇统一至今的 2200 多年,国土疆域一直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到公元前 210 年,秦朝的辽阔疆域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部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朝鲜半岛北部。秦朝开拓的疆域构成了以后历代中原王朝疆域的主体,成为中国统一的地理基础。

汉代疆域在秦的基础上主要有三方面的扩大:北部,在北方边界基本没变的情况下,占据了朝鲜三十八度线以北的领土;南部,占据了大半个越南,最南在胡志明市附近,不仅已包括今天云贵高原的全部,而且辖有今缅甸东部;西部扩张最大,控制了中亚地区,最西达到了巴尔喀什湖西岸以及塔什干附近。汉代的领土扩张奠定了中国对朝鲜、越南和新疆的统治基础。

隋朝,北方边界扩展到阴山以北,五原、定襄二郡的北界已接近今中蒙边界;在西北,隋朝从突厥取得了今新疆哈密地区,于大业四年(608 年)设置了伊吾郡,于大业五年设置了鄯善、且末、西海和河源四郡,辖境南起昆仑山脉,北至库鲁克塔格山脉,东起青海湖东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在云贵高原也有所扩展,开皇十三年(593 年)设南宁州总管府于味(今云南曲靖市),辖境东至今贵州西部,西至云南大理州。但数年后因爨蛮反抗而放弃;在南方,隋炀帝于大业元年(605 年)灭了林邑国,一度设置了三个新郡——比景、象浦、海阴,其中海阴已在西汉日南郡旧地之南。但在隋军撤退后数月,林邑即收复故地,隋朝的南界大致还在北纬 18° 即横山一带。

唐代,在北部,得到了东北南部、朝鲜西部、整个外蒙和大半个西伯利亚,最北达到贝加尔湖西北的安加拉河一带;在西部,到达了咸海和伊朗边界,囊括了整个阿富汗和绝大多数的中亚五国领土,南部第一次确认了对海南的统治。

宋朝疆域面积一直仅限于中原腹地和江南一带。宋朝与辽国的疆界长期稳定在雁门山—大茂山—白沟一线。与西夏作战时,宋神宗力图开扩疆土,取得了绥、熙、河、洮、岷、兰等

州。哲宗时又进一步取得了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的土地。宣和三年(1121年)西安州、怀德军又被西夏所取。建炎南渡之后,宋朝领土仅限于秦岭淮河以南、岷山以东地区。宋朝也在与大理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邕等州。

元朝疆域:在北方,西起今额尔齐斯河,东至鄂霍次克海;在东部,拥有朝鲜半岛东北部;在西南,包括今克什米尔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不丹、锡金等地,今缅甸东北部和泰国北部。与汉、唐极盛时期的疆域相比,元朝不仅在面积上大大超过了它们,而且在控制程度上也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吐蕃地区和今新疆东部三个直属于朝廷的单位(别失八里、哈刺火州、哈密力)以外,元朝在全国都设置了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其中包括汉唐时从未设置过正式行政区的蒙古高原以北和辽河下游以北地区。

明朝疆域:在北方,占据了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全部东北地区 and 大量的远东领土,但外蒙和大部分内蒙地区不在疆域内;在西部,恢复了除新疆外的所有领土;在西南,不仅恢复了自唐末由于南诏和大理的兴起而长时间失去的云南地区,而且还第一次确立了对西藏和青海的统治,这其中还包括整个不丹和锡金以及大半个克什米尔。

清朝疆域:从秦始皇灭六国、开疆拓土、建立秦帝国开始,经过了近2000年,中国终于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1000多万平方公里国土的空前统一的国家。

今天,中国国土的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次于俄罗斯、加拿大而居世界第三位。

(二)民族与人口

民族: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统称为中华民族。在历史上,中华民族的形成有一个渐次融合与演化的过程。上古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的中原民族和周边的少数民族,如北狄、西戎、南蛮、东夷等在常年的互相冲突、互相交流中逐渐融混为一体,形成了华夏族的前身。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中原各民族继续发展和壮大,而生活在其它边陲地区的民族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方文明,但是所有这些民族都以中原民族为一体向心之力,认为他们的民族亦是炎黄子孙,例如鲜卑族就认为他们是黄帝的第25子的后代。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起以华夏诸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并且通过书同文、行同伦、度同制、车同轨等一系列政治文化措施,使华夏族开始成为一个基本稳定的族体,为汉民族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秦汉以后,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在战争或经济交流中继续融合,比如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南北朝时的五胡乱华、唐代的安史之乱,使当时的许多少数民族,如匈奴、契丹、鲜卑、氐、羯等,都先后融混在华夏族里,并且逐渐形成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其他少数民族也纷纷以华夏族为宗族,团结、统一从此成为华夏各民族的共同心愿。近代中国在内忧外患特别是外敌入侵的灾难面前,一些仁人志士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得到了全国各族人民的群起响应,从此“中华民族”作为中国各民族的总称一直延用至今,成为全世界炎黄子孙的精神寄托和殷切期盼。

人口: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根据国家统计局2009年2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32802万人。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分布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而呈现出不同的状态。公元初,60%的人口分布在太行山、中条山以东,豫西山地、淮海以北,燕山山脉以南的区域内。而长江以南大多数地

区人口稀少,尤其是今浙江南部、福建、两广、贵州等地。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一是首都长安及其近郊;一是今山东菏泽、定陶、东明一带。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中心的转移、人口的迁移和自然条件的变迁,人口的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十世纪以后,主要的人口稠密区已经转移到南方,其中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福建人口尤其稠密。

我国历史上的人口迁移相当频繁。十四世纪中叶以前,移民的主流是由北向南,即从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及更南地区,其中以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唐朝安史之乱后、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的三次南迁影响最大、移民人数最多。明朝初年,数百万人口从长江以南迁到江淮之间、淮河流域,从长江中游迁到四川盆地,从山西迁至华北平原。此后直到二十世纪前期,移民的主流是从平原进入山区,从内地迁往边疆。随着沿海城市和工矿城市的兴起,又有大量人口从农村和小城镇迁入这些城市。此外,边疆或其它地区的强制性移民,敌对政权间的掠夺性移民,北方游牧民族、边疆少数民族的内迁,也曾多次发生,并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三)农业与经济

中国的地理环境、气候条件、自然资源以及人口分布背景等多种因素决定了华夏民族对农耕文明的选择。中国以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为基础,南北形成稻作和粟作史前两大农业系统的格局。两大农耕系统各自独立起源,并行发展,又发生传播和交流影响,成为中华农业文化的摇篮,中国文化的若干传统和民族心理的形成,都与此息息相关。

1、农业发展与生产工具改进

原始农业时期,农业工具以石器为主,并广泛使用木竹器、骨角器和蚌器。锄、铲一类翻土工具是稍后出现的,在我国尤以耒耜的使用最具特色,完全靠手工操作。从虞夏时代起,经商、西周迄春秋止,木石工具仍在广泛使用,但青铜工具已日益普遍地应用于农业生产中。在这一阶段的后期,铁农具和牛耕均已出现。从战国开始,中经秦、汉、魏、晋以及南北朝,铁犁和牛耕开始推广。隋、唐、宋、辽、夏、金、元诸代,农业工具继续有重大的发展。例如包括十一个部件的结构完整、使用轻便的曲辕犁,用于深耕的铁搭,适应南方水田作业的耢、耘耧、龙骨车、秧马和联合作业的高效农具如粪楼、推镰、水转连磨等。明代和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农业生产工具在这一时期没有重大的发展。在江南地区虽然出现过代耕犁,但并没有获得推广。这一方面是由于在封建地主制和小农经营条件下,农具改进已临近它的历史极限,另一方面也由于人多地少、劳力充裕的情况抑制了提高劳动效率的新式工具的产生。生产工具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尺度,是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物质标志。旧的工具被淘汰、新的工具诞生,实质上是古代生产力进步的具体表现。

2、农业发展与水利兴修

中国大部分地区气候受季风影响,降雨量年内分配很不均匀,往往不能满足农业的需要,亟需靠人工灌溉来保证。因此,中国的农业生产发展与水利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是对中国农业经济区的形成和转移有重大影响。如秦、汉时期,一系列大规模灌溉渠系陆续兴建,由此形成了关中、成都平原和冀、鲁、豫等几个重要农业经济区。东汉至魏、晋,陂塘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使江淮之间成为重要农业经济区。中唐以后,长江下游塘浦圩田水利的发展为农业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江南地区创造了条件。其次,水利促进了一些地区耕作栽培制度

的发展。如长江流域沮洳下湿地区,随着塘浦圩田水利的发展,排灌技术的进步,耕作栽培制就由一年一熟逐步演进为稻、麦两熟和两稻、一麦的制度。第三,水利使一些地区的作物组成发生变化。黄河流域自西周迄至春秋,主要农作物为黍、稷;而到战国、秦、汉时期,粟、菽(大豆)、麦则成为主要农作物。菽、麦对水分的要求较高,水利灌溉事业的发展是促成这一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再就是农田水利排灌事业的发展,促使一些低产地区变成农业高产区。

3、农业发展与重农措施

历代封建王朝还大力推广推行奖励垦荒政策。如春秋,齐国管仲改革内政,发展生产;战国,秦国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战;两汉时推行休养生息政策;三国时推行屯田制;北魏孝文帝推行均田制;唐初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北宋中期,王安石变法推行农田水利法;明初,明太祖鼓励垦荒,减免赋役,实行屯田,推广植棉;清初鼓励垦荒,康熙实行更名田,雍正实行摊丁入亩和地丁银制度。“农本”和“以农立国”思想是历代统治者一贯的指导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土地资源的利用率。封建国家还编纂农书,推动农业耕作技术的提高。各封建王朝通过上述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保证了农民的生产时间,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满足了农业对劳动力的需求,缓和了社会矛盾,为农业发展营造了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封建国家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三、自然、人文地理环境与中国民族文化

(一)农业型的经济模式与顺天应物精神

在古代历史发展中,只有在农业取得发展的地区,文化才能得以繁荣。中国是在大河孕育下农业最早得到发展的地区,因而也是文化最早兴盛的国度。从新石器时代起,一直到夏、商、周三代至整个封建社会统治时期,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的发展。究其原因,地理、气候环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良好的气候条件对农耕及农耕文明影响深远,使农耕自然经济易于发展延续。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文化(冯天瑜,1986)。

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这样描述东亚的气候:“东亚的气候与印度差不多,主要受亚洲大陆制约,……在夏季情况正好相反,中亚上空气流变暖而上升,湿润的海洋气流侵入,给大陆边缘地区带来大量的雨水。因为这些季风的影响,东亚大部分地方和印度许多地方在最适合作物生长的月份里降雨充沛,这些地区比欧洲南部在纬度上要向南得多。因为通常水量供给充足,加之日照充裕,所以能够精耕细作,许多地方一年收两熟作物。”(费正清,1992)汉学专家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中则谈到了农耕与文化的联系:“汉文化最早发祥于黄河中游的黄河谷地,包括汾河、渭河、泾河、洛河、沁河等大支流的河谷,也就是仰韶文化或彩陶遗物分布的核心地区。此一地区,自然条件便于原始农业的发展。其后向东扩张,进入黄河的大冲积扇及太行山麓成串较少的冲积扇。远在公元前4000年,这一带便存在着农耕的村落;西安半坡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大致到春秋时代,汉文化圈已掩有黄河的中游和下游流域。”(陈正祥,1983)可见,作为汉民族主要活动地域的黄河、长江流域发达的水系、平坦肥沃的土地以及适宜的气候条件,是农业兴盛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中国向来是以农立国,历代王朝都重视农业生产。西汉文帝二年颁布了第一道重

农的诏令：“农，天下之本也，民所恃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班固《汉书》）自此以后近2000年间，历代统治者关于农业的诏令史不绝书。农业生产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中的灵魂和核心。由于历代统治者一直推行“崇本抑末”政策，农业经济（战国以后是小农经济）始终是近代以前中国经济的主干部分，工商业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所占的份额极小。重生产轻交换导致中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男耕女织模式上，整个国家的经济运行模式也基本上是内向型的。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农业生活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性格。首先，顺天应物，即对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一体的认识。农业经济的最显著特点是“靠天”，文明早期艰苦的农业生活导致人们对自然界的依赖并对其产生感恩戴德的心情。由于农事与自然的季节密切相关，人们在生活中处处表现出对自然规律的顺应，在文化上表现为追寻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形成了“乐天知命”的民族性格，即“随遇而安”、“知足常乐”。这是早在原始社会，华夏祖先受荫于“天时地利”而形成的整体性的世界观。进入文明阶段以后，在“大和一”的地理环境及其所导致的一体化的社会结构的双重影响下，原始人的以“互相渗透”为特点的混沌的整体性的世界观以精致的形态继续延续下去，到了汉代得到完善，形成“一类和之，天人合一”（董仲舒）和“天人感应”的思想观念。人们将自然中的四季交替、风霜雪雨等现象同自己的生活和活动方式相统一，以求和谐、完整，即把世界看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将所有现象的变化看成这个整体的一种状态，而不把它看成各个单独事物的各自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看重弥漫于各种因素之中的共性力量而忽略它们的个性。

其次，务实精神。农业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忌好高骛远，脱离实际。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文化的特色。如在科技方面，最突出的是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在人文方面，重视伦常日用，而不企求来世与天国；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精神。求实入世的生活态度和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使人们懂得“几分耕耘，几分收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道理，因此“重实际而黜玄想”。“务实是农人的基本特点，不务实则无以收获。”（曹丕《典论·论文》）

第三，崇古循旧。农业文明的发达和汉民族对土地的重视和依赖，发展成重农轻商，安土重迁的观念与传统。“力田为生之本也”、“工商重则国贫”、“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成为人们的行为标准。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使人们的阅历和眼光均趋向了封闭保守，再加上宗法制度的严密规范，使人们的心理形成了一种崇古循旧定势。在农业社会里，从农业的春种秋收到人身的生老病死，从治国治民到修身养性，从科学技术的作用到思想文化的传播，如此等等，人们对各个领域的规律的认识，都是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经验积累。这种积年累月的带有很大盲目性的直观摸索，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昂贵的。因此，人们十分珍惜已有的经验，小心翼翼地维持着古已有之的局面。正是因为把传统的东西看得极为重要而伟大，于是就形成了崇古循旧的心理定势，上升到理论高度并系统化，便形成了源远流长的道统观念，对中华民族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二）封闭型的地理环境与天下一统观念

中国文化起源早，绵延长，不断积累发展，较少停滞，力量雄厚，传统深远，并未由于外来因素而中断或根本改变面貌，究其原因，封闭型的地理环境是因素之一。张岱年与程宜山

曾论及中国地理环境的三大特点：其一是大河大陆型与大漠大陆型环境的共存对峙，这就决定了农业文化与畜牧文化在中国历史上长期共存，既互相依赖又互相冲突的格局；其二是疆域辽阔，特别是长城以南有一大片宜农的平原，为中国古代两千年的统一准备了一个良好的地理基础；其三是与其它文明发祥地距离遥远，或者虽不遥远而为高山大漠所隔绝，这使得中国文化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张岱年，1990）十九世纪中叶以前，中国人一直把自己的国家当作世界的中心，宋朝的石介在《中国论》中说“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四夷外也，中国内也”。封闭的大陆环境以及由此造成的封闭的大国心态，深刻影响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杨根顺，2000）大陆型的文化在此生根发芽，“天下”和“四海之内”成为古代中国人“世界”的概念。

虽然对外有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与世界其它地区的文明缺乏联系，中国内陆却地域辽阔，复杂的地形和多样的气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缘文化和区域思想观念。早在先秦时代就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及岭南文化等。中原地区由于对农业的重视而养成重土安迁的观念；东南沿海一带由于耕地有限，重视海外贸易，思想观念开放；西北的绿洲地区因土地限制和地处交通要道，商业发达较早；北方游牧民族由于环境恶劣，不得不以频繁的迁徙和战争来对付环境的压力。中国的区域文化虽然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但又并存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体多元结构。随着中国农耕经济向周边的扩张，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包容性又促使区域文化的相辅相成，渐趋合一。儒、道、佛三教的并行而立，盛唐时的胡汉交融，都充分的说明了这一点。正是由于这种多样性及包容性，中国传统文化始终保持着生机与活力。广大地域上人群的迁移及人群间许久以来的相互交流形成中国古代的“天下”观念，即追求统一。甲骨文中就有了“四方”的明确记载，到西周时“天下”的观念已十分清晰，如《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历代王朝总以追求“四夷宾服”，“天下归心”为王朝强盛的标志。“天下”、“四方”观即追求统一，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念，它是威力持久的中国理念，对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起到过重要作用。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其所以能顽强地生存发展并绵延至今而不坠，究其原因，其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它的统一性。中国文化在其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同时汇聚了国内各民族文化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发挥了强有力的同化作用；在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刻都未曾分裂和瓦解过。即使在内忧外患的危急存亡关头，在政治纷乱、国家分裂的情况下，它仍能够保持完整和统一，这一特征是在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中都难以找到的。形成这一特征的主要原因是由多种因素和条件构成的。史学家黄仁宇曾论及地理环境在其中的作用，他说：“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重要功臣。”（黄仁宇，1997）在这种大环境下展开的文化系统，不仅能迅速完成内部的统一，而且不易受外族入侵而中断。在秦朝统一中国的前后，世界其它几个古老文明区域也在大体相近的时代出现了类似的统一帝国，但它们后来都走向以分裂割据为主的政治格局，只有中华文明区后来仍以统一局面为主，发展了比较完备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表现出了

更大的凝聚力,而这归根结底还是受了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的驱使,或者说,得益于地理环境所提供的可供尝试而成功率较高的途径。

综上所述,在历史的长河中,受以上特点的影响,华夏民族逐渐培养出了勤劳刻苦、注重实践、善于创造、群体意识强烈、重血缘亲情、重协调和谐、重伦理道德、富于包容性等一系列文化特性。经过漫长的历史选择和积累,这些特性逐渐形成比较稳定的精神气质。待到诸子百家特别是儒、道两家兴起,运用哲学理性对上述精神气质进行加工、提炼、型塑,形成各具特色的思想体系,包括各具特色的思维方式,并凝结为经典文本,才成为一套可以稳定延续下去的文化基因。它首先体现在华夏民族上层文化大传统中,然后在许多世代中通过大、小传统的相互影响和交流,逐渐融入民间文化小传统,从而在世世代代汉族人的灵魂中留下清晰的印记。

第二节 英国文化发展之地理环境

一、英国自然地理环境特征

(一)地势变化多端

英国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其西北地区主要地形是高原;而东部和东南部则主要是低地。全境就地势而言可分四区:英格兰东南部平原区,中西部山地区(海拔 120-500 米),苏格兰山地区(海拔 600-900 米)和北爱尔兰安特利姆高原。

英格兰占有大不列颠岛的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地势绵延起伏,自西向东分为四部分:以塞文河流域为中心的米德兰平原;海拔 200 米左右的高地;伦敦盆地;威尔德丘陵。英格兰东南部是平原区。北部是有名的奔宁山脉,自十九世纪以来就被称为“英格兰之背”。北奔宁山脉的西部为湖区。奔宁山脉以南和以东、威尔士山地以东地区是由平原、低地、丘陵相间排列组成的大片英格兰低地。主要河流包括泰晤士河和塞文河。主要城市包括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纽卡斯尔和伯明翰。多佛港附近的英吉利海峡隧道将英国与海峡对岸的法国相连接。

苏格兰包括大不列颠岛北部以及附近的许多岛屿,地势变化多端。南部为平原,最南部的切维特丘陵同英格兰接壤;北部和西部主要是高地,苏格兰高原区的山峰呈浑圆形,主要山脉有格兰扁山脉,其主峰尼维斯山海拔 1343 米,为大不列颠岛的最高点;中部较为低平,是苏格兰中央平原,由克莱德河和弗思河及其支流经过的低山和起伏的谷地组成。

威尔士在大不列颠岛的西部偏南部分,境内多山、地势崎岖。威尔士境内有 1/4 的土地被列为国家公园及天然保护区。北部大多是山地和沼泽地,斯诺登山峰高耸在坎布里亚山脉上。阿伯里斯特威斯市的东部和南部是威尔士的中央高原区,一般平均高约两千英尺。威尔士西南是彭布罗克半岛,西北海岸外海中的安格尔西岛的地形几乎完全是平坦的。

北爱尔兰居爱尔兰岛东北部,隔爱尔兰海与大不列颠岛遥遥相望。这一地区包括贝尔法斯特湾和内伊湖周围的肥沃土地,向南延伸至莫恩山脉,西北至斯珀林山脉,东北为安特利姆高原。北爱尔兰地区湖泊较多,纳湖(396 平方公里)面积居全国之首,沿湖为平原。

(二)气候湿润温和

英国是四面环海的岛国,海岸线总长约 1.15 万公里。受大西洋暖流影响,属温带海洋性气候;全年气候湿润,冬季温和,夏季凉爽,一年四季温差不大。冬季,整个英国皆处于北大西洋暖流形成的“暖湾”之中,比起世界上其它同纬度地区气温高得多。夏季由于受海洋调节和凉爽西风的影响,气温低于其它同纬度地区。

英国境内各地间气温有明显的差异。冬季,北大西洋暖流的影响以西部和西南沿海最为显著,愈向内陆和愈向东去,影响愈小。反之,从欧亚大陆时而侵入的寒冷气流,则主要影响东部并往往造成严寒天气。因此,冬季英国境内的等温线基本上是南北向,即气温差异主要在东、西之间。夏季英国各地气温的变化主要受纬度差的控制,表现为南暖北凉。

英国大部分地区的年降水量为 600—1500 毫米,不仅远远超过苏联和加拿大的草原带,也多于欧洲大陆。降水分布特点是:西部多于东部、北部多于南部、高地多于低地。受高纬度的影响,英国昼夜长短的变化特别明显。冬季日照较少,白昼较短。夏季是英国降雨量最少的季节,相对较为干燥,且日照充足。由于一系列低气压的影响,英国每天的天气变化无常。全年一半时间皆处在降雨天气,多为小到中雨,秋冬季节降雨最多。因此英国较为潮湿,常有雾气天气,冬季雾天更多。伦敦有“雾城”之称。

(三)适中的地理环境

就地理环境而言,英国的边界都在海岸线上,地理条件相当特殊,具备一个“适中”的特征:与欧洲大陆既不相连,也不太远;幅员即不太大,也不太小;地势既不平坦,亦不险恶;气候既不太冷,也不太热,等等。对立的因素处于比较平衡、从而趋中的状态。历史已经证明,就商品经济和个人自由而言,这样一方水土提供了一种比较适宜的环境:对外,作为欧洲大陆的近邻,英国在文化、宗教、经济、社会、政治等各方面能够不断吸收后者的文明成果,同时,“对来自国外的每一种习惯和原则都作出独特的改动,盖上自己的印记。”(温斯顿·丘吉尔,1983)在这样一个位置开展对外贸易也格外便利,因为在近代以前,几乎所有大宗货物,尤其笨重物品的运输,都必须走水路。此外,由于不列颠岛孤悬海外,有海洋作为天然屏障,也减轻了它所受到的外来威胁。对内,英国地势颇为复杂。西北群山起伏,高原相接,而海拔一般都在一千米以上。东南比较低平,又为无数河谷、密林和丘陵所阻隔。四方各处人民可以长年安居,形成并保持各不相同的习俗,地方自治的传统由此而扎下了深深的根。在这片土地上,还均匀分布着泰晤士、塞文、特伦特等众多河流,水势缓慢,适合商业航运。气候凉爽湿润,温差不大,四季风雨不绝,阴晴变化无常,却罕见灾害性的狂风暴雨。这对岛民们的生活方式影响甚大,使他们逐渐养成了坚强而又克制的性情。岛国适中的地理环境形成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即人际之间易于协商共处,从而减少了冲突,易于实现统一、稳定和安全。对于法治和代议制的成长而言,这都是至关重要的条件。

二、英国人文地理环境特征

(一)疆域

英国于公元 827 年建立统一的英格兰王国。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三世于 1171 年和 1172 年入侵爱尔兰和威尔士,并将其列入英国版图。1707 年,英格兰王国与苏格兰王国合并,称为“大不列颠王国”(联合王国)。1921 年,爱尔兰南部获得自治权,1936 年成为共和国。北部

爱尔兰的6郡仍留在英国,因此,英国遂改名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在英国国土扩张历史上,远在英王亨利八世在位时期,英国就开始实施对外扩张政策。在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的殖民疆域达到最广,也曾一度是全球唯一的工业化强权国家。二十世纪中叶,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全球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其殖民地纷纷独立,大英帝国逐渐瓦解。

现代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由大不列颠岛上的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岛东北部的北爱尔兰,以及邻近的5000多个小岛共同组成。英国隔北海、多佛尔海峡、英吉利海峡与欧洲大陆相望。南隔英吉利海峡与法国相望;东濒北海,面对比利时、荷兰、德国、丹麦和挪威等国;西邻爱尔兰共和国,横隔大西洋与美国、加拿大遥遥相对;北过大西洋可达冰岛。全国面积约为24万平方公里。大不列颠岛是欧洲最大的岛屿,从南部海岸到苏格兰的最北部约近1000公里,横向最宽约近500公里。

(二)民族与人口

民族:与西欧大陆相比,英格兰社会多民族和部族的相对均衡的特征十分突出。由于东南沿海地区比较低平,又有数条水势缓慢的河流,西欧大陆的原始部落和文明民族都可以跨海登陆,并溯河而上深入内地。在十二世纪前的三千多年里,先后有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罗马人、盎格鲁人、撒克逊人等许多民族入岛定居。新石器时代,欧洲西南部的伊比利亚人开始移入,之后移入的是南欧的凯尔特人。凯尔特族的第一批为盖尔人,是苏格兰、爱尔兰人的祖先,使用盖尔语。第二批为属凯尔特人的不列颠人,是威尔士人的祖先。公元前一世纪,罗马人来到不列颠岛,带来了拉丁字母。罗马人对英国的占领大概持续了四个世纪。五世纪中叶,西日耳曼部落的盎格鲁人,撒克逊人,以及原来生活在日德兰半岛的朱特人纷纷涌入不列颠岛。其中盎格鲁人较为强大,称该岛为“盎格鲁的土地(Angle-land)”,英格兰(England)一词便源于此。八世纪,英国又被另一支日耳曼民族部落掠夺,他们是居住在斯堪的那维亚半岛(今挪威与瑞典地区)的北欧人,也称为斯堪的那维亚人。1066年,英国成为诺曼人的属国。诺曼人是十世纪时定居于诺曼底的斯堪的那维亚人与法国人的后裔,诺曼底公爵威廉于1066年即位英格兰王,确立了贵族制,开始了诺曼底王朝。随后,活跃在德国的条顿人(同样是日耳曼民族的一支)纷纷移民到不列颠岛。此时,当今的英国民族基本定型,主体为日耳曼民族。

在漫长的民族迁徙过程中,新老居民无一占绝对多数,没有能力将其他民族赶尽杀绝或置于自己的奴役之下,但都可以凭借复杂的地势偏安一隅。年长日久,他们便锻炼出一种将顽强的抗争与理智的妥协相结合的能力,并形成共存共荣的意识。开放和均衡给社会带来蓬勃的生机。中世纪中期以后,英格兰成为西欧首屈一指的繁荣、强盛之邦,民众的衣食也最丰盛。在这个基础之上,政治生活趋于温和、开明。冲突各方常常相互让步以求共处,自我更新以实现融合。种种制度在缓慢的渐进过程中实现转变。个人自由和权利由此得到一定的保障,并且不断扩充发展。近代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率先诞生于英国不是偶然的。

人口:英国是人烟稠密的国家。人口约6020万(2005年6月),其中英格兰人口达5040万,苏格兰达510万,威尔士为300万,北爱尔兰达170万。官方和通用语均为英语。英国人口城市化程度高,城市人口占总人口80%,伦敦人口占全国人口1/5,故人口分布与